

《朝野僉载》之“节略本”考略

赵毓龙 胡 胜

以往学界在讨论《朝野僉载》的版本时,主要关注所谓“六卷本”与“一卷本”^①,而这两个版本系统实际是明人辑录之后生成的,不能为我们提供更多有关该书在宋代传播情况的信息。对宋代类书收录该书情况的考察,倒是可为我们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。《类说》卷四十收录《朝野僉载》67条,《紺珠集》卷三收录68条^②,均比《说郭》所收36条多出近一倍。而不计重复,两书所收合计77条,更是《说郭》条数的两倍多。通过比较,我们发现两本文字基本相同,而与《太平广记》和《说郭》有较大出入^③,则两本所据《朝野僉载》属于与《广记》和《说郭》所据不同的另外一个版本系统。从其文字面貌看,很可能是《直斋书录解題》著录的“一卷节略本”。又,在宋元明清类书、小说选集和文人笔记中多见对改本文字的引用,则此版本在明清仍有影响,过去却一直为我们所忽视。

“六卷本”与“一卷本”文字非出自一源,前人已有比较和说明^④。而《类说》、《紺珠集》所收文字比较接近,它们与《广记》和《说郭》的差异则较大,这种差异在四本共收的条目中体现得最为明显。据笔者统计,四本共收的条目有5条^⑤。比较这5条,我们发现:四本文字虽互有差异,但比较而言,《广记》

①六卷本系陈继儒自《太平广记》中辑出,收入《宝颜堂秘笈》,是后来比较通行的本子;一卷本系吴永录自《说郭》中辑出,收入《续百川学海》,属于该系统的本子有《历代小史》本、《古今说海》本等。

②《紺珠集》中“金刚舞夜叉歌”与“烹奴蒸婢”两条,在《类说》中合录为“金刚舞夜叉歌”,故两书条目数实际相同。

③本文所据四书版本,分别为:《太平广记》,中华书局,1961年;《说郭》,涵芬楼本,中国书店,1986年;《类说》,明天启六年岳鍾秀刻本;《紺珠集》,四库全书本。以下引文不再出注释。

④见赵守俨:《朝野僉载·点校说明》,中华书局,1997年。

⑤其中,王及善得号事,《太平广记》、《说郭》合列一条,《类说》、《紺珠集》分列两条,诸葛昂、高赞比豪奢事,《太平广记》、《说郭》、《类说》合列一条,《紺珠集》分列两条,本文按合列者计算。

与《说郭》文字较为接近,《类说》与《绀珠集》文字较为接近,如写严升期贪贿事:

唐洛州司仓严升期摄侍御史,于江南巡察。性嗜牛肉,所至州县,烹宰极多。事无大小,入金则弭。凡到处,金银为之涌贵,故江南人呼为金牛御史。(《太平广记》)

周洛州司仓严升期摄侍御史,于江南道巡察。性嗜水犊肉,所至州县,烹宰极多。小事大事,入金则弭。凡到处,金银为之踊贵,故江南人号为金牛御史。(《说郭》)

武后时严升期为御史,巡察江南。嗜牛肉而多受金,号金牛御史。(《类说》)

武后时严升期摄御史,巡按江南。嗜牛肉而多受人金,故号金牛御史。(《绀珠集》)

《广记》与《说郭》文字确实存在差异,如“唐”与“周”、“牛肉”与“水犊肉”、“事无大小”与“小事大事”等,而《类说》与《绀珠集》在个别地方,也不尽相同,如“巡察”与“巡按”、“受金”与“受人金”等,但从整体面貌看,前两者文字较为接近,后两者文字较为接近,两组之间文字差异较大,又是显而易见的。再如写王及善得污名事:

唐王及善才行庸猥,风神钝浊,为内史时,人号为鸬集凤池。俄迁文昌右相,无他政,但不许令史之驴入台,终日追逐,无时暂舍,时人号驱驴宰相。(《太平广记》)

王及善才行庸猥,风神钝浊,为内史时,人号为鸬集凤池。俄迁文昌右相,无他政,但不许令史奴驴入台,王终日追逐,无时暂舍,时人号为驱驴宰相。(《说郭》)

王及善才行庸猥,为内史时,号鸬集凤池。(《类说》)

王方庆迁左丞,无他政事,但不许令史驴入台门,终日追逐,时号驱驴宰相。(《类说》)

王及善才行庸猥,为内史,号为鸬集凤池。(《绀珠集》)

及善后为右相,无甚施設,惟不许吏辈将驴入堂,终日驱逐,号为驱驴宰相。(《绀珠集》)

这里,《类说》与《绀珠集》在“驱驴宰相”条上差异较大,主要是《绀珠集》与前三者产生了明显异文。案《类说》收书严谨,《四库提要》称其照原文“未尝改窜一词”,相对而言,《绀珠集》对原文的严谨态度则差之。姑不论文字短长,《类说》文字与《广记》、《说郭》比较接近,原文似当如此,而《绀珠集》之异文似是编纂者改写所致。而从体例看:《广记》与《说郭》均将王及善事迹合一条叙述,而《类说》与《绀珠集》都将“鸬集凤池”与“驱驴宰相”析为两条,这是两组文字最大的差异。

又如写张元一作诗嘲武懿宗事,《广记》、《说郭》记事因详备,而《类说》

与《绀珠集》重在录诗,故这里只比较四本所录诗如下:

元一于御前嘲懿宗曰:“长弓短度箭,蜀马临阶骗。去贼七百里,隈墙独自战。甲仗总抛却,骑猪正南掾。”上曰:“懿宗有马,何因骑猪?”对曰:“骑猪,夹豕走也。”(《太平广记》)

元一于御前嘲懿宗曰:“长弓短度箭,蜀马临阶骗。去贼七百里,隅墙独自战。甲仗总抛却,骑猪正南蹕。”上曰:“懿宗有马,何因骑猪?”对曰:“骑猪者,夹豕走也。”(《说郛》)

张元一朝曰:“长弓度短箭,蜀马临阶骗。去贼七百里,偎墙独自战。甲仗总抛却,骑猪正南还。”后曰:“何不乘马?”曰:“骑猪,夹豕也。”(《类说》)

张元一朝曰:“长弓度短箭,蜀马临阶骗。去贼七百里,偎墙独自战。甲仗总抛却,骑猪正南窞。”后曰:“何不乘马?”曰:“骑猪,夹豕也。”(《绀珠集》)

可以看到,无论是叙事口吻、措辞,还是所录诗歌,《广记》与《说郛》都十分相似。两本首句均系“长弓短度箭”。因武懿宗形貌丑陋,故有是称。而《类说》、《绀珠集》录“短度箭”为“度短箭”,则似不通。《广记》所谓“隈墙”与《说郛》所谓“隅墙”,均状武氏瑟缩于墙角之貌,“隈”、“隅”本同义,且形近。而《类说》与《绀珠集》则称“偎墙”,即倚墙而战,虽亦可通,却是另外一种意思了,正说明它们两者源自同一本子。

当然,在上文比较中已经可以看到,《类说》与《绀珠集》的文字是有差异的。尽管如此,笔者以为,两书所据应当还是属于同一个系统:

首先,从两本互见条目的数量看,有 57 条之多,均占到各自条目数的 80% 以上。

其次,从互见条目的分布看,两书顺序一致者多,且分布密集,多是相邻条目(主要集中于前半部分),如自“驼李”(所列条目名目以《类说》为准)至“鸠集凤池”连续 10 条,两书顺序完全一致,再如自“九月得霜鹰”至“金刚舞夜叉歌”连续 5 条,自“刺史不是守鞋人”至“猪号乌金”连续 6 条,顺序都是完全一致的。

第三,从文字整体匹配度看,文字差异较大者,只有上述 3 条,仅占互见条目数的 5%,其余条目文字差异则不甚大。其中,文字全同者有 11 条,只差 1 字者有 6 条,合计占到互见条目数的 30%,此外,“娄师德卫灵公”、“银兔符”、“壁龙”等 3 条仅差 2 字,“驼李”、“赐麻数车”、“猪号乌金”、“鸡肆”、“姓方贵人认为亲戚”等 5 条仅差 3 字,则相差 3 字以内者合计有 25 条,已然占到互见条目总数的 40% 以上。

应该说,总体上看,两本依据的本子是属于同一个系统的。当然,虽然两书所据属于同一个系统,但未必是同一个本子,在流传过程中,同一系统的各本之间文字存在差异,是合理的。

那么两书所据之《朝野僉载》，究竟是怎样一个本子呢？

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著录《朝野僉载》二十卷；《宋史·艺文志》同，又另增《补遗》三卷；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著录一卷，并云：“其书本三十卷（案：当为二十卷），此特其节略耳。”^①则在宋代，大约有三种本子行世：二十卷原本；三卷补遗本；一卷节略本。《说郛》收录《朝野僉载》，书名下注“二十卷”，则《类说》与《绀珠集》所据应非二十卷原本。而从文字面貌看，很可能就是陈氏著录的“一卷节略本”。开篇所引两条，已很清楚地反映出这种节略的文字特征，特别是第二条张元一嘲武懿宗事，《太平广记》所载计 206 字，不仅有张嘲武诗，亦有武叶韵反嘲张诗，《说郛》所载计 135 字，而《类说》所载仅 57 字，《绀珠集》所载仅 56 字，不及《说郛》本一半、《广记》本三分之一，字数差额如此大，诸多细节被删略了。

或以为两书文字与《广记》、《说郛》不同，是类书编纂者删改造成的，笔者以为不然：

其一，虽然《类说》在收录文献时，对原文删削较多，但如前所说，曾慥本人对文字的态度是比较严谨的。《四库总目·〈类说〉提要》著录该书时云：“每书虽经节录，其存于今者以原本相较，未尝改窜一词。如李繁《邺侯家传》下有注云，每于泌皆称先公，今改作泌云云。即一字之际，犹详慎不苟如此。可见宋时风俗近古，非明人逞臆妄改者所可同日语矣。”^②所谓“未尝改窜一词”也未免绝对，但曾慥删而不改的总体倾向则是事实。特别像第三例中的差异，若系曾慥改动所致，则是由对改错，且是韵字上出错，对于一个态度审慎的人而言，可能性极小。

其二，《类说》、《绀珠集》所收《朝野僉载》的文字，在前代书中亦可发现。旧题唐人冯贽编撰的《云仙散录》卷九收录《朝野僉载》7 条。此 7 条与《类说》文字基本一致，而与《广记》、《说郛》所收差异较大，如有关韩王元嘉铜樽的记载：

韩王元嘉有一铜樽，背上贮酒而一足倚。满则正立，不满则倾。（《太平广记》）

韩王元嘉有一铜鹤樽，背上注酒则一足倚。满则正，不满则倾侧。（《云仙散录》）^③

韩王元嘉有一铜鹤樽，背上注酒则一足倚。满则正，不满则欹。（《类说》）

①[宋]陈振孙：《直斋书录解题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 年，第 317 页。

②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二三，子部“杂家类”七，中华书局，1965 年，第 1061 页。

③ [后唐]冯贽：《云仙散录》，中华书局，1986 年，第 123 页。

再比如关于杜景俭的记载:

凤阁侍郎杜景俭,文章知识并高远,时号鹤鸣鸡树。(《云仙散录》)^①

凤阁侍郎杜景俭,文章知识并高远,时号鹤鸣鸡树。(《类说》)

周凤阁侍郎杜景俭,文笔宏瞻,知识高远,时在凤阁,时人号为鹤鸣鸡树。(《说郭》)

这里,不仅叙述语言差异较大,连人名亦不同。可知《云仙散录》与《类说》所据为同一本子,而与我们所熟悉的“六卷本”和“一卷本”均不同。《云仙散录》旧题唐冯贽编撰。据卷末冯氏自序,其当为唐末五代初人,而后人多以为此书非出冯氏之手,然其成书当不迟于北宋^②,在《类说》成书之前。这说明,《类说》与《广记》、《说郭》所据文字的差异,主要不是类书编纂剪裁过程中造成的,而是在当时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节略的本子。

三

而从后人引用的情况看,这个“节略本”的《朝野僉载》在宋以后依然有影响。

元人杨瑀《山居新话》引《朝野僉载》“御史例不还脚钱”事^③,该事亦见于《太平广记》,但《山居新话》的文字与《类说》本基本相同,而与《太平广记》本差异较大,如下:

御史李申请禄米,送至宅,母遣量之,剩三石,问其故。令史曰:“御史例不概。”又问脚钱。又曰:“御史例不还脚钱。”母怒,送剩米及脚钱以责审,诸御史皆有惭色。(《山居新话》)

御史李申请禄米,送至宅,母遣量之,剩三石,问其故。令史曰:“御史例不概。”又问:“车脚钱几?”又曰:“御史例不还脚钱。”母怒,送剩米及脚钱以责审,诸御史皆有惭色。(《类说》)

监察御史李畬母清素贞洁。畬请禄米,送至宅,母遣量之,剩三石,问其故。令史曰:“御史例不概。”又问:“车脚钱几?”又曰:“御史例不还脚车钱。”母怒,令送所剩米及脚钱以责畬。畬乃追仓官科罪。诸御史皆有惭色。(《太平广记》)

《山居新话》与《类说》所引文字,除李母第二次询问,一为间接引语,一为直接引语外,文字全同,而与《太平广记》所记差异较大。可知杨瑀所据系《类说》相同系统的本子。

再如明冯梦龙《古今谭概》卷十五贪秽部云:

《朝野僉载》:滕王为隆州刺史,多不法。参军裴聿谏止之。王怒,令左

①《云仙散录》,第124页。

②余嘉锡:《四库提要辩证》,中华书局,1980年,第1038、1039页。

③杨瑀:《山居新话》,知不足斋本。

右捫搦。他日聿入计,具诉于帝。帝问聿:“曾被几搦?”聿曰:“前后八搦。”即令迁八阶。聿归叹曰:“何其命薄若言九搦,当入五品矣!”闻者哂之,号“八搦将军”。^①

此条不见于“六卷本”、“一卷本”,而见于《类说》,除“止”作“正”,“即”作“遂”外,文字全同。则冯梦龙引《朝野僉载》系据《类说》本。又同书卷三十口碑部“麒麟楮”条:

唐杨炯每呼朝士为麒麟楮。或问之。曰:“今假装麒麟,必修饰其形,覆之驴上,及去其皮,还是驴耳。”^②

此条虽未标明出自《朝野僉载》,但《类说》与《绀珠集》本《朝野僉载》中均收有此条,文字与之基本相同。《广记》本亦收此条,差异甚大:

唐杨炯每呼朝士为麒麟楮。或问之。曰:“今假弄麒麟者,必修饰其形,覆之驴上,宛然异物;又去其皮,还是驴耳。无德而朱紫,何以异是?”(《类说》)

唐杨炯每呼朝士为麒麟楮。或问之。曰:“今假弄麒麟者,必修饰其形,覆之驴上,宛然异物;及去其皮,还是驴耳。无德而朱紫,何以异是?”(《绀珠集》)

唐衢州盈川令杨炯,词学优长,恃才简倨,不容于时。每见朝官,目为麒麟楮许怨。人问其故?杨曰:“今铺乐假弄麒麟者,刻画头角,修饰皮毛,覆之驴上,巡场而走。及脱皮褐,还是驴马,无德而衣朱紫者,与驴覆麟皮何别矣?”(《太平广记》)

显然,《谭概》中的文字是出自《类说》和《绀珠集》本所在的系统。此外,明张岱所辑《夜航船》卷六“选举部”亦引此条,文字与《类说》和《绀珠集》同,且比《谭概》多引至“无德而朱紫,何以异是”^③。

又如清翟灏《通俗编》“车载斗量”条引《朝野僉载》云:

《朝野僉载》:武后时,官滥,民间谣曰:“补缺连车载,拾遗平斗量。”^④而《类说》、《绀珠集》与《广记》同载此条,文字差异较大:

武后时,官滥。谣曰:“补阙连车载,拾遗平斗量,把推待御史,碗脱校书郎。”(《类说》)

武后时,官滥。谣曰:“补阙连车载,拾遗平斗量,把推待御史,碗脱校书郎。”(《绀珠集》)

则天革命,举人不试皆与官,起家至御史、评事、拾遗、补阙者不可胜

①冯梦龙:《古今谭概》,中华书局,2007年,第188页。

②冯梦龙:《古今谭概》,第405页。

③张岱:《夜航船》卷六“选举·滥爵”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1135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年,第587页。

④翟灏:《通俗编》卷二十六,乾隆竹简斋本。

数。张鷟为谣曰：“补阙连车载，拾遗平斗量。杷推侍御史，碗脱校书郎。”（《太平广记》）

在《广记》中以 27 字描述武后时职官泛滥的情形，而在《类说》与《绀珠集》中仅以区区 5 字概括之，而翟灏所引文字显然出于后者。

由上可知，“节略本”的《朝野僉载》尽管在宋以后即亡佚，但其佚文却经《类说》、《绀珠集》等小说类书存留下来，为文人、学者引用，则其在后世的传播又是自成体系的。

综上所述，《类说》与《绀珠集》本《朝野僉载》同《广记》和《说郛》本相比较，无论是在文字的整体规模，还是在细节处，均存在较大差异，而《类说》与《绀珠集》的文字则较为接近，同属于与“六卷本”、“一卷本”异源的又一个版本系统。其文字呈现出节略的特征。该本在宋元时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，及至明清类书或文人笔记中亦可见对该本文字的引用，则其流传又是自成体系的。《类说》与《绀珠集》所引《朝野僉载》条数较多，不计互见者，近 80 条，数量是比较可观的。可以作为整体对象，供学界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。

作者单位：赵毓龙，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

胡 胜，辽宁大学文学院